满文的演变发展等问题也会有诸多创获。

在简介《盛京刑部原档》一书及其价值的同时，也必须指出它的局限。刑部原档是按照刑部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，因此，有案必录，细微不捐，必然显得零碎琐细，不及官书的系统完备，加以崇德三、四两年的刑部原档毕竟是刑部全部档案的一小部分，只有同官书及其它方面的史料结合起来，进行综合性的研究，方可望充分发挥这部分档案应有的价值。

《盛京刑部原档》全书近十二万字，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、刘景宪译注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屈六生校订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张晋藩教授为该书写了序，从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评价，对阅读和利用该书的档案起到指点门径的作用。

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述评

戎　笙

所谓宫中档，指的是缴回宫中的臣工奏折和皇帝批谕。臣工奏折的内容十分广泛，从请安、谢恩、雨雪、收成、祥瑞、灾害，到矿务、田制、军需、河工、海防、漕运等等包罗万象。皇帝批谕长短不一，几十字、几百字，有的长达千余字，短的只有一二字，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。奏折照例应由具奏人亲笔书写，不得假手他人，所奏内容不得外泄，由具奏人亲自密封装入折盒内派可靠人（多为亲信家丁）送呈皇帝批阅；皇帝批复后，发还原奏人，不许传阅，不许互相打听批谕的内容，更不许传抄。清圣祖时奏折制度就已相当严密，但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定期缴还制度。清世宗即位之初，便下令内外文武大臣必须及时缴还硃批奏折，不准抄写、存留、隐匿或焚弃，违者“断不宽宥，定行从重治罪”。自此以后，缴还硃批奏折，便成定制。由于这种禁令十分严厉，原档缴回以后，便深藏宫中，外人不得一见。即使在史馆供职人员也无缘一睹。它是清代各种档册的原始文献，其史料价值之高，是通行的经涂饰删改的官方文书根本无法比拟的。

清政府被推翻以后，这些缴回宫中的硃批奏折，仍堆积在懋勤殿中。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，接管了这些档案，随后整理了李煦、王鸿绪、年羹尧等人的密奏的一小部分，在《文献丛编》《史料旬刊》等刊物上陆续发表。

大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曾将一批宫中档运往台湾，总计约十五万八千四百余件。其中康熙朝汉文3154件，满文810件；雍正朝汉文22375件，满文898件；乾隆朝汉文59446件，满文69件；嘉庆朝汉文19936件；道光朝汉文12492件，满文155件；咸丰朝汉文17092件，满文434件；光绪朝汉文18759件，满文431件。这些档案运到台湾后，和其他运往台湾的清代文献一样，长期搁置在台中雾峰附近的北沟乡间，与世隔绝。直到1958年才开始整理康、雍两朝的硃批奏折。1965年，这批档案随同台湾故宫博物迁到台北市郊士林外双溪。1969年创办的《故宫文献》季刊，公布了该院所藏康、雍两朝的硃批奏折，每期所能刊布者为数极少，不过几十件百余件而已，1970年以后，出版档案的速度逐步加快。在《故宫文献》创刊周年之际，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了《袁世凯奏折》专辑，作为《故宫文献》特刊第一集，按入奏年月依次编排，套红影印，共八册。这部专辑收录了该院所藏袁世凯全部奏折，主要是光绪戊戌以后

十年间袁世凯平步青云时期的奏折。这部专辑与《谕折汇存》、《养寿园奏议辑要》中所收袁世凯奏折相比，不仅在数量上要多出很多，而且它是原始档案资料，没有经过窜改、涂饰、删节、润色，比较接近事实真象。

继《袁世凯奏折》专辑出版之后，台湾故宫博物院又出版了《年羹尧奏折》专辑。年羹尧是盛清名臣，官至川陕总督，它的奏折对研究康、雍间的政治和军事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解放前，故宫博物院曾在《掌故丛编》及《文献丛编》等刊物中刊载过年羹尧的部分奏折，数量很少。《年羹尧奏折》专辑收入汉文原折90件，满文原折194件，满文函牍 9 件，满汉文上谕40件。将以前在《掌故丛编》及《文献丛编》上刊载过的奏折，一并收入，并附臣工参劾年羹尧的奏折及年羹尧传记三种。全书共三册，套红影印，作为《故宫文献》特刊第二集，于1971年12月出版。

1971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该院收藏宫中档全部编制了索引卡片，既可供学术界使用研究，也为进一步出版档案资料奠定了基础。

由于上述档案资料的公布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。1972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（A-CLS）派代表前往台北了解故宫文献出版的可能性。1973年春，该会决定捐助一笔资金，作为《故宫文献》的出版基金。

1973年 6 月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编印光绪奏折，书名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》。其进度大致是每月出版一册，于1975年 7 月出齐。影印16开本，26大册，共收光绪朝折片两万三千余件，按年月编排，后附题奏人索引。自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》出版后，《故宫文献》季刊不再刊登宫中档，改印军机处“月折”。

继光绪朝奏折出版之后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编辑出版康熙朝奏折。康熙朝汉文奏折近三千件，满文奏折八百余件。把以前在《故宫文献》季刊中已经印布的康熙朝汉文谕折也一并收入，共计九册，其中汉文七册，满文二册。

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接踵问世，共32辑，其中汉文奏折27辑，满文奏折 5 辑，于1980年 6 月出齐。由于字体缩小，容量增加几倍，每辑约八、九十万字。但字迹因之模糊，有些已不易辨认了。

清世宗于雍正十年曾将历年臣工奏折及硃批，选出其中可以公开者，加以涂饰删改，印发给大臣阅读，直到高宗乾隆三年才以硃墨刊印成书。全书共录雍正朝外任官员223人(实际署名上奏的不止此数）的奏折及硃批，这便是世人公认的保存了丰富的珍贵史料的《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》，通称《硃批谕旨》。但此书所收，不过雍正朝奏折和硃批的十分之二，而且是经过窜改的，失去了原档的本来面目。有些奏折和硃批，改得面目全非，有些则几乎是重新改写的。这种窜改，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，并就如何窜改、为何窜改等等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研究。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的出版，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极重要的资料。其史料价值之高，是刊本《硃批谕旨》所不可比拟的。

继雍正朝奏折出版之后，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2年 5 月开始出版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。其中以乾隆16年 7 月至21年12月、28年 1 月至30年12月、32年 7 月至33年12月、38年11月至39年10月、42年 1 月至44年 6 月、46年 8 月至49年 5 月、51年 6 月至54年12月等年月所存较为完备，其余年分，缺漏不全。虽然如此，全部编印出版，估计将有60册。

这些缴回宫中的奏折原档，影印出版供学术界使用是非常必要的。但可惜编辑工作过于粗疏，以致错误百出，损害了该档的珍贵价值。

康熙时期的奏折，规格尚无定制，字体大小不一。《宫中档康熙朝奏折》由于缩版不当，在切边时有不少文字被切或几乎被切。这不仅影响版面的美观，而且字迹不易辨认。至于编辑、校对方面的错误，俯拾即是。现以《宫中档康熙朝奏折》汉文的最后一辑为例，7页目录，竟有300多处错误。例如“细鳞鱼”误为“细麟鱼”，“陕西”误为“陜西”，“金国正”误为“赵弘燮”，“张玉书”误为“张五书”，“郎廷极”误为“郎延极”，“万安”误为“万女”，“两淮”误为“两准”等等。至于页码错误之多，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，实在令人吃惊。《宫中档康熙朝奏折》前九辑套红影印，不少硃批却被印成黑色，只好加盖一小戳：“此系红色硃批”。有的上下栏倒置，只好用钢笔注明：“上下栏对调”等字样。最糟糕的是，编辑人员水平太低，工作不负责任，妄自窜改原文，弄得文义不通，闹成笑话。例如第2辑第93页，载雍正元年1月26日鄂尔泰奏折的御批墨录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前各案亏空损补之项，当与督抚商酌，应令在历米前任督抚司道赔补，岂可累及现任无辜之员也，税在尔等若肯任怨实心任事……”。“应令在历米前任”和“税在尔等若肯任怨实心任事”，这是编辑人员妄自窜改的文句，谁能读懂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把它和雍正手书硃批加以对照时，立刻就可以发现，原来是编辑人员把“来”字误改成“米”字，把草书“总”字误改成“税”字。再如，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第25辑第687页刊有奏折一件，奏为请将灶丁归并灶地征收以免苦累事。这一奏折被编辑人员误认为是无年月无题奏人的奏折，故编入第25辑。其实，只要稍为细心一点，查查《硃批谕旨》就可发现，这个奏折既有年月日，也有题奏人，即雍正2年闰4月26日署江苏巡抚何天培奏，应编入第2辑第620页与何天培同一日奏折并列。编辑工作的粗疏例子很多，不必一一列举。印刷装订之粗疏也是惊人的，我读的一部《宫中档雍正朝朝奏折》，其中的第27辑第170—171，174—175，178—179，182—183诸页，竟然全是空白。印刷时漏印，装订时没有抽换，以致造成这一辑的严重缺陷。任何一个读者在碰到这些空白页时，都会感到十分遗憾的。

学术动态

一九八一年《清史问题》介绍

吴　伯　娅

《清史问题》是美国一本专门研究清史的杂志，每年出版两期，6月、12月出版。主要刊载研究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、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学、哲学、宗教、艺术等文章。同时也发表有关清史讨论会等学术消息。

1981年6月号的《清史问题》共载有《顺治时期的山东——地方统治的建立和乡绅的反应》、《旅行指南——明清时期的路程书籍》、《十九世纪晚期的中美关系——总理衙门档案研究》、《内阁档案和清代司法程序研究》、《太平天国和法国的联系——日意格（Prosqer·Giquel）1864年的日记》等文。

《顺治时期的山东——地方统治的建立和乡绅的反应》系朝鲜李成珪所著。1980年被译成日文、发表在日本《明代史研究》上后。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乔舒亚·A·福杰尔（Joshua.A·Fogel）又从日文译成英文。这篇文章共分四节：一、引言；二、清初乡绅阶级的状况；三、